薪傳五十年

——台灣法學院法史學碩博士論文*

黃源盛** 黃琴唐 江存孝***

要 目

- 壹、序說
- 貳、1956年至1978年的奠基期
- 參、1979年至1995年的傳承期
- 肆、1996年以後的轉型期
- 伍、結語——省思與展望

摘要

法史學研究的對象至少可以涵蓋四個面向，即法律規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在此界定下，本文針

* 今年（2008）11月28日適逢台灣法史學界一代導師戴炎輝教授（1908-1992）的百歲冥誕。先生春風化雨四十餘載，在法制史及身分法學兩領域，著作等身。說起台灣各大學開設「中國法制史」及「唐律專題研究」等課程，先生是第一人；指導研究生撰寫法史論文，先生是領航者。撫今追昔，孺慕與感念之情油然而生，因題成文，以誌追思。

** 黃源盛，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黃琴唐、江存孝，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對五十年來臺灣法學院中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的發展情形進行分析與評述。從指導師資的更迭和論文研究取向的歸類來看，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一為1956年到1978年的奠基期，一為自1979年以迄1995年的傳承期，時至近十五年來，有了很大的變化，是為轉型期。

綜觀三個階段的重大衍變，除了論文產出學校的版圖分佈發生推移外，論文的研究主題，也隨著史料發掘和師資、社會氛圍的變遷，呈現出日益多元的景象。尤其，近年來臺灣法史與晚清民國法史研究的蓬勃發展，以及裁判法史的漸受重視，是為一大特色。

透過法學院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發展情形的分析，展望未來，法學界的法史學研究與教學仍有幾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其一、進一步促進中國法史與台灣法史研究的交融；其次、持續強化不同學科間的科際整合；再者、注重行深法史基礎理論人才的培養。而有關法史學研究人才的育成，以務實的角度來看，不妨採取「擇優栽培」的方式。

關鍵詞：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臺灣法律史、碩博士論文

壹、序說

如果把法史學的研究看作是一條學術的江流，可以說，這條江流是來自多源頭的。放眼中外，法史學的研究並非被獨佔於某一特定的學術領域之中，而是以一種整合性的學科方式呈現。以台灣為例，其研究及教學者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學術社群，一為法學界、二為文史學界、另一為社會學界。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和教學者，各有其不同的學術專長風格，使得法史學的發展，呈現出多元多彩的景象。

迄今，台灣的法史學教學與研究，已然走過半個世紀的歲月，途中或深或淺的步履，卻有被歷史的落英日漸掩埋的遺憾。為了重現曾經走過的軌跡，並且一探學子對於法史教學的感受，黃源盛曾經撰寫〈近十年來台灣法史學教育的實證分析（1993-2002）〉與〈從黃昏到黎明——台灣法律系學生對法史教育的觀感評析〉兩篇專文，¹針對國內各大學的法史學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不過，該二文主要側重在各法律系大學部所開設法史學課程的評述。本文則希望循著這個脈絡，進一步對台灣法學院法史學相關的碩博士論文研究成果做一整體回顧，並稍事評析。至於文史、社會學界的研究業績，倘它日機緣遇合，將另撰文細說。²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有必要先界定的是，何謂「法史學」（Legal History）？法史學的研究對象理應是什麼？其範

1 參閱黃源盛，〈近十年來台灣法史學教育的實證分析（1993~2002）〉，載於《法制史研究》3（2002），頁305-335；黃源盛，〈從黃昏到黎明——台灣法律系學生對法史教育的觀感評析〉，載於《法制史研究》4（2003），頁349-369。

2 文史學界有關法史學的碩博士論文研究成果，在近些年來的部分，可參閱高明士，〈台灣近十年來（1995~2004）大學文史研究所對「中國法制史」研究概況〉，收於《法制史研究》7（2005），頁343-356。

圍該有多廣？這關係到本文對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的採樣。

基本上，法史學既屬於法學，又可說屬於史學；另外一方面，在法學內，它是融合理論法學與經驗法學於一門的學科。曾有人說：法史學是「以理論認識為主要任務的一門法經驗科學，與法解釋學有所不同。」進一步言，法史學可說是「透過過去文獻記載記錄為基礎來研究過去曾發生過的法律現象，甚至對於過去的法律現象為一番因果關係的說明。」³如果同意這種講法，那麼，法史學的研究應該不只是歷史材料的堆積。一篇法史學的研究論文，理當有「史」有「論」，而「史」、「論」兼備的期望，與歷史學研究中「歷史敘事」和「歷史解釋」⁴如何相互依存以求得真理之探討，其實有著相通之處。

相較於文史及社會學界，台灣法學界在法史學研究與教學的起步較早，對於法史學的學科定位也相對明確，一般將之歸類於「基礎法學」的範疇中。⁵既然列在法學研究之林，自然有其偏向於法律學門關切的重點，因此，在研究者身上難免有所謂「前見」的觀念性存在。⁶這些「前見」可能在學習的過程中便不自覺地依附在研究者身上，尤其來自於西方的近代法律思維模式，有可能如影隨形般地形成一種研究態度的基底。而這些西方式法概念對於研究者的影響，恐怕不只在於

3 參閱楊日然，《法理學》（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231-233。

4 關於「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的相互關係，可參閱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2003），第十三章「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頁225以下。

5 「基礎法學」本身即為一種廣泛的概念，並無絕對的定義，但一般而言，以「法史學」、「法理學」、「法社會學」、「比較法學」為主要的研究領域。關於與歷史學界的差異，可參考張世菁、莊以馨整理，〈法史學教學研究方法論座談會紀實〉，收於《法制史研究》3（2002），頁417-433。其中，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邱澎生助研究員曾提及法史學在史學界的定位僅為一個專史，並不像法學界有較明確的定位。

6 參閱陳曉楓，〈《歷代刑法志》：話語、語境與前見作用〉，收於《批判與重建——中國法律史研究反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頁267。

「敘事」或者「解釋」而已，甚至在面對「界定法史學的研究對象」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時，都有可能受到相當程度的左右。⁷

問題是，法史學的研究對象要如何界定？對於法史學研究中的「法概念」，究竟要採取「限縮式的法概念」？抑或「擴張式的法概念」？⁸這恐怕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看法可能存在著分歧。

我們以為，如果將敘述人類全部生活變遷的歷史，稱之為「文化史」，那麼，敘述其中法律生活變遷的歷史，即是「法律史」。循著這個概念，法史學研究的對象至少可以涵蓋四個面向，即法律規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換言之，所謂的「法史學」，乃是針對過去的法律規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法律意識等，觀其現象特質，察其變革因果，衡其良窳得失，乃至探求當中所蘊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以資後人借鏡的一門學科。在此定義下，本文對於台灣法學院法史學碩博士論文資料的蒐羅，凡涉及上述四個面向的題材，都一併納入。惟限於篇幅，僅擬針對中國法史和台灣法史方面的研究主題進行取樣與評述，而不涉及西洋法史或其它外國法史的主題領域。而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引述的碩博士論文相關資訊，主要源自於自家的藏書、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的典藏，以及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與各校圖書館網頁的搜尋，囿於時間、心力，疏漏定所難免，容日後再行補正。

7 舉例而言，「法概念論」是法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之一，「法是什麼？」這個問題一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進程中佔有一定的位置，在各種不同的「法的概念」的說法背後，便對法學研究的方法論產生影響。其詳參閱楊日然，《法理學》，頁36以下。

8 參閱顏厥安，〈中國法制史與其他法學課程的關係——以法理學為例檢討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對象〉，收於《法與實踐理性》（台北：允晨文化，1998），頁87。

至於法學界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發展的分期，從指導論文數量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師資之更迭，以及論文研究取向的變動情形來看，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一為自1956年以迄1978年的奠基期；一為自1979年以迄1995年的傳承期；時至近十五年來，有了很大的變化，是為轉型期。在奠基期與傳承期，指導師資的代表人物各為戴炎輝和巨煥武兩位教授，他們分別帶動了法學院碩博士生從事《唐律》和明清律研究的風潮，並先後在1978年、1995年退出指導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的行列；1996年迄今的轉型期中，則以王泰升及黃源盛二氏，以台灣法律史和晚清民國法史的相關研究，較大幅度地左右了論文質與量的發展。

貳、1956年至1978年的奠基期

1950以迄1970年代的台灣，法學教育初興、基礎法學未萌。令人意外的是，在那段日子裡，仍然有若干先行者默默地走進法史學這塊荒漠，並且引領學子們開墾耕耘。

一、師資與論文在各大學的分佈

從1956年起到1978年止，台灣的法學院共產生30篇有關法史學的碩士論文及1篇博士論文，⁹這些論文分別來自中國文化大學（17篇）、台灣大學（11篇）、政治大學（2篇）與中興大學（1篇）。¹⁰其中，以中國文化大學和台灣大學兩校分占多數，各居總產量的55%及35%，合計達到論文總數的

9 此31篇論文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文附表一。

10 中興大學法學院於民國八十九年（2000）改制為台北大學，其沿革詳見該校網頁：<http://www.ntpu.edu.tw/about/about1.php>。

90%。

在此階段內，論文之所以集中在這兩間學府，細究其原因，乃由於「師資之所在，即論文之所在」。經查，當時在研究所開設法史專題研究課程者不多，中國文化大學有戴炎輝、陳顧遠等教師兼職；台灣大學有戴炎輝、陳顧遠、張慶楨等先生坐鎮。相較之下，政治大學的法史學課程僅由陳顧遠先生兼任；中興大學亦只有林詠榮先生一人擔綱。由於這時期的法史學論文，幾乎都出自上述幾位師長的指導，因此各校出產的論文數量，也就隨著師資配置的多寡而出現明顯的差異。在31篇的論文中，各指導教授所佔篇數分別為：戴炎輝14篇、陳顧遠8篇、何任清2篇、張慶楨2篇、林詠榮1篇、戴東雄1篇、韓忠謨1篇、楊日然1篇、方豪1篇。論文產出學校及指導師資之分佈統計，參閱下表：

表一 「奠基期」論文產出學校與指導師資分佈情形

論文產出學校 指導老師	文化 大學	中興 大學	台灣 大學	政治 大學	總計
方 豪				1	1
何任清	2				2
林詠榮		1			1
張慶楨	1		1		2
陳顧遠	7			1	8
楊日然			1		1
戴炎輝	7		7		14
戴東雄			1		1
韓忠謨			1		1
總 計	17	1	11	2	31

二、論文研究主題的相關分析

上述31篇碩博士論文，從研究主題所涉獵的領域來看，大致可分為「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與「台灣法律史」，三者的數量各為18篇、12篇和1篇。論文主題與師資、學校的詳細分佈情形，詳見下表二及表三：

表二 「奠基期」論文產出學校與研究主題分佈情形

論文產出學校 研究主題		文化 大學	中興 大學	台灣 大學	政治 大學	總計
		中國 法制 史	跨代通論	4		2
中外比較				1		1
唐律研究	7			1		8
清律研究				2	1	3
中國 法律 思想 史	跨代通論			2		2
	先秦思想	6	1	3		10
台灣 法律 史	日治時期				1	1
總計		17	1	11	2	31

表三 「奠基期」論文指導師資與研究主題分佈情形

指導老師 研究主題		方 豪	何 任 清	林 詠 榮	張 慶 楨	陳 顧 遠	楊 日 然	戴 炎 輝	戴 東 雄	韓 忠 謨	總 計
		中國 法制 史	跨代通論					3		3	
中外比較								1			1
唐律研究						1		7			8
清律研究						1		2			3

中國法律思想史	跨代通論							1		1	2
	先秦思想		2	1	2	3	1		1		10
台灣法律史	日治時期	1									1
總計		1	2	1	2	8	1	14	1	1	31

（一）中國法制史

在「中國法制史」的論文方面，研究主題以《唐律》居多，此種現象在中國文化大學尤其明顯。進一步看，專研《唐律》者共有8篇，分別為：（1）〈唐律上盜罪之研究〉（施啓揚，1962）；（2）〈唐律除免當贖法之研究〉（張溯崇，1963）；（3）〈論唐律二罪以上從重與更犯〉（林茂松，1964）；（4）〈唐律家族主義論〉（潘維和，1964）；（5）〈唐律上犯罪構成要件之研究〉（張瑞釗，1965）；（6）〈唐律立法精神之研究〉（黃錕炎，1970）；（7）〈唐律上之共犯〉（李伸一，1971）；（8）〈唐代官人在刑事法上之地位〉（張溯崇，1972）。此外，以《唐律》為研究對象的跨代通論性著作尚有：（1）〈唐明清律刑事責任條件之研究——以毆傷殺害為中心論點〉（唐國賢，1977）；（2）〈唐明律優遇官人規定之研究〉（勞政武，1975）。（3）〈唐律與日本養老律之名例比較研究〉（矢部宗晴，1972）。¹¹

上述諸論文中，〈唐代官人在刑事法上之地位〉為張溯崇在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當時隸屬於法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張氏師從戴炎輝先生，係戴先生所指導

¹¹ 除了前述的論文外，鄭文肅所撰〈儒家法律思想與唐律研究〉（1973）亦有一章專門討論唐律的規定，然因該文主要偏重儒家法律思想的探討，故本文將其歸諸「中國法律思想史」的類別。

的第一位博士生，除碩博士論文外，後來另著有《清代刑法之研究》及法史專論多篇，¹²長期任教於國防管理學院及中國文化大學，講授法史相關課程。此外，林茂松所作〈論唐律二罪以上從重與更犯〉，後來收錄於2005年出版的《中國法制史探索：林茂松古稀自選集》¹³；潘維和之〈唐律家族主義論〉、勞政武所撰〈唐明律優遇官人規定之研究〉，亦經改寫後，先後正式出版專書。¹⁴

至於研究《唐律》以外主題者，分別有：（1）《親等制度之法制史的研究》（尹載秀，1962）；（2）〈我國固有法上之刑官〉（羅正展，1966）；（3）〈清代婦女之法律地位〉（帥珂羅，1968）；（4）〈中國典權之研究〉（王文，1972）；（5）〈清律贖刑之研究〉（陳臬，1972）；（6）〈中國固有法上之復仇〉（張瑞楠，1975）；（7）〈固有法上尤其清代的婚姻法〉（李愛香，1977）。其中，王文的論文於1974年由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書名為《中國典權制度之研究》¹⁵，是過去學界探討傳統中國典權制度的重要參考著作；陳臬的論文亦於1975年間，以《清律贖刑論》為題

12 張溯崇的專論主要有〈論我國固有法上之擅斷主義〉，載於《東吳法聲》（台北：東吳大學法律系）10（1974.01）；〈清代律例簡釋〉，載於《東吳法聲》12（1978.06）；〈淺說春秋折獄〉，載於《東吳法聲》第13期；〈竹簡秦律概說〉，載於《東吳法聲》18（1981.06）；〈我國古代法上之禁錮刑〉，載於《法苑》8（1976.10）；〈唐律上法官責任〉，載於《華岡學報》7（1973.07）；〈國民政府時代行政組織法之研究〉，載於《法學論叢》1（1992.08）。

13 參閱林茂松，《中國法制史探索：林茂松古稀自選集》（台北：正典出版社，2005）。林氏另將日本·仁井田陞所著《中國法制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編譯成《中國法制史新論》（台北：環宇出版社，1976）。

14 參閱潘維和，《唐律家族主義論》（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年）；勞政武，《論唐明律對官人之優遇》（台北：萬年青書店，1976）。附帶說明的是，潘維和所撰，〈唐律家族主義論〉，於1965年時，即由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以「華岡學報第一期」暨以書代刊的形式對外印行，名為《唐律上家族主義之研究》；1974年間，潘氏復將《唐律家族主義論》交漢林出版社重新出版，雖然書名更改為《唐律學通義》，但查其實質內容，幾乎一字未改。

15 參閱王文，《中國典權制度之研究》（台北：嘉新文化基金會，1974）。

印行。¹⁶

何以此期間內，中國法制史方面的碩博士論文偏重在《唐律》的相關研究？想必與戴炎輝教授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在1950至1970年代間，戴教授先後於台灣大學和中國文化大學兩校法律研究所開設「中國法制史專題研究」和「唐律專題研究」的課程，專授其精研的《唐律》相關主題，此一課程長達二十多年，對於這段時期研究生論文之選題，影響極大。

戴炎輝先生（1908-1992），台灣屏東人。1930年3月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專修法學。1933年畢業後，再入大學院，師從法史學權威中田熏先生，此後即致力於法史學的研究，陸續在刊物上發表相關論文。1935年，通過日本高等文官司法考試，因無意出仕，旋即束裝返台，先執律師業，復膺任法院推事，再執教於台灣大學法學院。¹⁷戴先生治學嚴謹，著述等身，撰有《中國法制史》、《唐律通論》、《唐律各論》、《中國身分法史》、《清代台灣之鄉治》、《傳統中華社會的民刑法制》等專書，以及法史學論文數十篇。其中，《唐律通論》、《唐律各論》不但享譽國內，同時受到日本學界的高度肯定，也奠定了他在《唐律》研究上的泰斗地位。

《唐律通論》共分三編，除第三編為《唐律》的條文附錄外，第一編總論，先說明《唐律》在法制史上的地位、〈名例〉之沿革、民刑責任劃分、犯罪與刑罰、刑事犯與行政犯的內涵等；第二編名例，則將《唐律·名例》篇的57條文分為26章詳細剖析。《唐律各論》分上、下兩冊，是就《唐律·名

16 參閱陳泉，《清律贖刑論》（台北：撰者印行，1975）。

17 參閱黃源盛，〈中國法制史學會紀要〉，載於，《法制史研究》創刊號（2000），頁380；黃靜嘉，〈戴炎輝：樸實嚴謹、開一代宗風的大師〉，載於《法制史研究》5（2004），頁189-195。

例》以外的445條律文逐一闡釋，考論精詳。¹⁸這兩部著作最特殊之處，在於運用當代法學的語言和體系，對於中國舊律的內涵及特色進行析解。這種以近現代西方法學觀點詮釋傳統中國法制的研究方法，在往後長期且深刻地影響著台灣的法史學研究取徑。¹⁹

（二）中國法律思想史

翻閱此階段的「中國法律思想史」論文，研究對象幾乎集中在先秦儒墨法三家的法理思想，達到10篇之多。其中，研究對象為特定人物者有：（1）〈韓非法思想之研究〉（魏季倫，1965）；（2）〈韓非子法律思想之研究〉（武九靈，1964）；（3）〈墨子的法律思想研究〉（梁開天，1967）；（4）〈管子法律思想研究〉（高吉臨，1971）；（5）〈從功利主義的觀點看韓非的法思想〉（鎌倉國年，1973）；（6）〈荀子禮法思想之研究〉（陳適庸，1974）。

研究主題為先秦時期整體法律思想者，計有：（1）〈儒家法律思想〉（林銘治，1966）；（2）〈先秦法律思想之研究〉（施湘興，1966）；（3）〈中國古代法律思想與自然法〉（耿雲卿，1971）；（4）〈法家思想及其對固有法制之影響〉（李瓊蔭，1977）。當中，耿雲卿的論文於1973年間，改寫為《先秦法律思想與自然法》付梓問世。²⁰

另外，有兩篇論文是屬於跨代通論性質的思想史研究，分別為：（1）〈中國古代法治思想之研究〉（薛博允，1970）；（2）〈儒家法律思想與唐律研究〉（鄭文肅，

18 詳參戴炎輝，《唐律通論》（台北：國立編譯館，1964）；戴炎輝，《唐律各論》（台北：成文出版社，1988）。

19 參閱陳惠馨，〈法史學的研究方法——從戴炎輝先生的相關研究談起〉，收錄於黃源盛主編，《法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戴炎輝先生九五冥誕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國法制史學會，2004），頁25-57。

20 參閱耿雲卿，《先秦法律思想與自然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

1973)

從論文的指導教授來看，12篇法律思想史論文中，陳顧遠指導3篇，何任清指導2篇，張慶楨指導2篇，林咏榮、楊日然、戴東雄、韓忠謨各指導一篇。與「中國法制史」的主題相比，指導師資集中於一人的情形較不明顯。不過，其中指導數量較多且影響較大者為陳顧遠教授。

陳顧遠先生（1896-1981），陝西三原人。1919年，進入北京大學攻讀政治學，1923年畢業，獲法學士學位，留北大政治系擔任助教，同時兼在北平中國大學、平民大學等私立大學授課，爾後，又曾任教於上海法科大學及安徽大學法學院。抗戰軍興後，曾擔任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及朝陽學院的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席；抗戰勝利後，任教於中央大學、上海法學院；國民政府遷台後，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軍法學校、東吳大學等校，先後開設中國法制史課程。陳氏曾受教於法制史學大家程樹德先生，其研究中國法制史，基本上延續了程樹德、楊鴻烈等前輩以史學角度著眼的方式，主要的著作有《中國古代婚姻史》、《中國婚姻史》、《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制史概要》及《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一書，是他研究中國法系基本精神的成果匯集，收錄了〈從中國文化本位上論中國法制及其形成發展並予以重新評價〉、〈從中國法制史上看中國文化的四大精神〉、〈中國固有法系之簡要造像〉、〈中國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中國現行法制之史的觀察〉、〈中華法系之回顧及其前瞻〉等關於中華法系研究的宏觀性論文，深入探究中華法系的特質及其根本精神所在。該書目前在台灣雖已絕版，但在中國大陸的學界卻經常地被引用，頗受重視。²¹

21 參閱范忠信，〈陳顧遠先生對中國法律史學術的出色貢獻〉，收錄於《中國文

仔細讀過陳顧遠先生所指導的各篇論文，不管選題取向或論述風格均頗為類似，大致上較為主觀抽象而疏闊，對於史料的掌握並不太重視，是為其特色之一。

（三）台灣法律史

在這段「奠基期」中，相當特別的是，出現了一篇關於台灣法律史的碩士論文。該篇論文的作者黃靜嘉²²，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因緣際會下，於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時隸屬於法學院）撰寫法學碩士論文，主題為〈日本帝國主義之下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1956），指導教授是曾執教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並兼天主教神職的方豪先生。不過，根據黃氏的自述，由於當時方豪先生自謙對台灣法律史的研究不深，且以教學、研究及天主堂事務太忙，乃又安排其拜見戴炎輝先生。此後，這篇論文轉由戴先生親自審閱批改。因此，戴炎輝先生可以說是此篇論文的實際指導老師。²³該文在1960年，曾以《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為題對外印行；2002年間，復經修改擴增，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黃靜嘉先生可說是碩博士生研究台灣法史學的先行者，難能可貴的是，在那個中國法史位居獨佔主流的時代裡，以台灣法制歷史作為研究的對象，顯然具有獨到的慧力與膽識。下

化與中國法系——陳顧遠法律史論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頁1-6。

22 黃靜嘉，浙江永嘉人，1924年生。私立東吳大學法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學士及政治研究所碩士、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比較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東亞法資深研究員兩年。曾任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長等職。編校薛允升的《讀例存疑》，著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台北：社會科學叢刊社，1960）；《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2002）；《中國法制史論述叢稿》（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另有中英文論文多篇。

23 參閱黃靜嘉，〈戴炎輝：樸實嚴謹、開一代宗風的大師〉，頁203-204。

一篇以台灣法史作為研究主題的法學界碩博士論文，直到1986年才出現，²⁴而台灣法律史碩博士論文的興起，更遲至1996年以後。此間相隔四十年之久，自有其政治社會的歷史因緣。

總體來看，在「奠基期」的階段中，法史學的前輩學者一度雲集台灣，「中國法制史」更一度於1959年至1971年間列入國家司法考試的應試科目範圍，在考試領導教學的利誘下，也曾受重視一時。但在璀璨之後，似乎又歸於平靜，法史學方面學術人才的養成在數量上並沒有明顯的增長。

參、1979年至1995年的傳承期

在1979年至1995年的這段期間，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的主要指導師資進行了世代交替，但相關論文的研究取材與研究方法，基本上仍維持在「奠基期」的格局裡，是為「傳承期」。不過，在此時期，無論是論文產出的學校數、專精人才的育成，或者論文的產量，都有了微幅的成長，也呈現出若干的特色。

一、論文學校、師資與主題的分佈情形

在論文產出學校方面，新增了政治作戰學校、國防管理學院及輔仁大學。²⁵統計論文分佈的情形，政治大學有13篇、台灣大學12篇、中興大學4篇、中國文化大學2篇、國防管理學院2篇、政治作戰學校1篇、輔仁大學1篇，合計35篇。²⁶其

24 鄭淑屏，〈台灣在日治時期警察法令與犯罪控制〉（台北：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25 政治作戰學校法律系於1989年併入國防管理學院，2006年再納併入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沿革亦請見該校網頁：<http://www.ndu.edu.tw/html/A1/history.html>。

26 此35篇論文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文附表二。

中，政治大學的論文數量較前期大有成長，而中國文化大學則巨幅下滑。

就指導師資來看，以巨煥武指導13篇論文數量最多，其次分別為林文雄3.5篇、林咏榮3篇、張溯崇3篇、戴東雄3篇、馬漢寶2篇、張偉仁2篇、黃源盛2篇、孫廣德1篇、蔡墩銘1篇、盧瑞鍾1篇、韓忠謨0.5篇。²⁷論文產出學校與指導師資的交叉比對資料，詳見下表四。

表四 「傳承期」論文產出學校與指導師資分佈情形

論文產出學校 指導老師	文化 大學	中興 大學	台灣 大學	政治 大學	輔仁 大學	政戰學 院及國 管學院	總計
巨煥武				13			13
林咏榮		3					3
林文雄			3.5				3.5
馬漢寶		1	1				2
孫廣德			1				1
張溯崇	2					1	3
張偉仁			2				2
黃源盛						2	2
蔡墩銘					1		1
戴東雄			3				3
盧瑞鐘			1				1
韓忠謨			0.5				0.5
總計	2	4	12	13	1	3	35

在論文的研究主題上，「中國法制史」類有25篇，「中國法律思想史」類有9篇，「台灣法律史」類有1篇。論文主題與產出學校、指導師資的交叉分析統計如下：

27 各教師指導論文數量的計量方式，單獨指導者計為一篇，二人共同指導者各計0.5篇。

表五 「傳承期」論文產出學校與研究主題分佈情形

論文產出學校 研究主題		文化 大學	中興 大學	台灣 大學	政治 大學	政戰學 院及國 管學院	輔仁 大學	總計
		中國 法制史	跨代通論			1		2
中外比較			1	1	1			3
兩漢法制			1					1
唐律研究	1			1				2
明清法制			1	1	12			14
晚清民國	1			1				2
思想史 中國法律	跨代通論			1				1
	中外比較		1					1
	先秦兩漢			5		1		6
	晚清民國			1				1
法律史 台灣						1		1
總計		2	4	12	13	3	1	35

表六 「傳承期」論文指導師資與研究主題分佈情形

指導老師 研究主題		巨 煥武	林 咏榮	林 文雄	馬 漢寶	孫 廣德	張 溯崇	張 偉仁	黃 源盛	蔡 墩銘	戴 東雄	盧 瑞鐘	韓 忠謨	總 計
		中國 法制史	跨代 通論								2		1	
中外 比較	1		1	0.5									0.5	3
兩漢 法制			1											1
唐律 研究							1				1			2
明清 法制	12		1					1						14
晚清 民國							1	1						2
思想史 中國法律	跨代 通論				1									1
	中外 比較				1									1
	先秦 兩漢			3		1	1				1			6
	晚清 民國									1				1

法律史	台灣	日治時期								1				1	
總計			13	3	3.5	2	1	3	2	2	1	3	1	0.5	35

在專研「中國法制史」的論文方面，跨代通論性的研究有3篇，分別為：（1）〈從固有刑律看傳統婦女地位之演變——由固有刑罰與緣坐之觀點出發〉（陳仙丹，1991）；（2）〈從法史學觀點論我國刑法上之通姦罪〉（柯勝義，1993）；（3）〈我國傳統法律教育的研究〉（杜傳榮，1994）。

兩漢法制研究有1篇，《唐律》研究有2篇，各為：（1）〈漢代春秋折獄之研究〉（黃源盛，1982）；（2）〈唐律上婚姻規定之探討〉（侯英冷，1990）；（3）〈唐律與現行刑法上有關親屬犯罪之比較研究〉（莊進國，1986）。

關於明清律的研究計14篇，分別是：（1）〈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研究〉（那思陸，1980）；（2）〈明律之誣告罪〉（蔡瑞煙，1985）；（3）〈施公案與清代法制〉（陳華，1988）；（4）〈明律中的竊盜罪〉（宋國業，1988）；（5）〈明清律中的賭博罪〉（李金澤，1990）；（6）〈明清律之白晝搶奪罪〉（簡松柏，1990）；（7）〈清律中之詐欺官私取財罪〉（陳美伶，1992）；（8）〈清律中的誤殺罪〉（林永富，1993）；（9）〈清律中之放火故燒人房屋罪〉（林德川，1993）；（10）〈明律中的風憲官吏犯贓罪〉（許必奇，1994）；（11）〈明律中的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罪〉（劉興浪，1994）；（12）〈清律中的「坐贓致罪」罪——社交禮儀餽贈之刑事立法例〉（宋名晰，1994）；（13）〈清律中的略人略賣人罪〉（吳武川，1994）；（14）〈清律中的私鑄銅錢罪〉（沈宏裕，1995）。其中，第一篇為那思陸的碩士論文，在1982年以《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的書名出版，

2006年間，復於中國大陸發行簡體字版，是目前研究清代司法審判制度頗具參考價值的一部專書。²⁸

又晚清民國法制研究和中外法制比較的論文分別有2篇、3篇，前者為：（1）〈大清新刑律的禮教爭議〉（謝靜雯，1986）；（2）〈清末民初法律演變之研究〉（林永義，1988）。後者為：（1）〈中日韓三國近親禁婚及同姓結婚之比較研究〉（金根植，1984）；（2）〈中韓刑律中之事後受財罪〉（韓相敦，1988）；（3）〈中韓傳統刑律主觀主義立法〉（韓相敦，1992）。

在「中國法律思想史」方面的論文與「奠基期」一樣，主要集中在先秦兩漢思想的研究，共有6篇，分別是：（1）〈從分析法學的觀點論韓非的法律思想〉（陳時提，1979）；（2）〈董仲舒法律思想之研究〉（武藤邦夫，1981）；（3）〈孔子法律思想之研究〉（李進勇，1981）；（4）〈韓非子的法術思想〉（金珍煥，1988）；（5）〈荀子的禮治思想〉（鄭貴和，1988）；（6）〈管子與子產法治思想之研究〉（韓毓傑，1990）。其中，第四、五篇乃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當時該所尚隸屬於法學院之下。

另跨代通論、中外比較及晚清民國時期思想研究的論文各有1篇，分別是：（1）〈朝鮮朝經國大典與中國傳統法律思想〉（韓基宗，1992）；（2）〈中國先秦法律思想與羅馬法律思想比較研究〉（韓基宗，1985）；（3）〈沈家本法律思想與晚清刑律變遷〉（黃源盛，1991）。

此外，在「傳承期」中，輔仁大學亦出現一篇以台灣法制歷史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是由蔡墩銘所指導的〈台灣在日據

28 參閱那思陸，《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另著有《清代中國司法審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明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台北：正典出版社，2002）、《中國審判制度史》（台北：正典出版社，2004）等書。

時期警察法令與犯罪控制》（鄭淑屏，1986）。

二、論文發展的特色

大致上，此一階段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的年產量較「奠基期」略有提升，出產論文的學校也由原先的4所增加到6所，而從論文研究的對象來看，出現以下的兩個特點：

（一）研究主題多樣性與研究重心的轉移

在前述的「奠基期」，除了黃靜嘉以台灣法律史為主題的論文為一大特點外，「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論文主題幾乎全數集中在《唐律》、明清律和通論的部分，分別佔總數18篇中的8篇、3篇、6篇，其中以《唐律》作為研究對象之一者，更高達11篇，可謂以《唐律》研究為鮮明特色的時期。而在此「傳承期」中，有關「中國法制史」的論文，研究主題較為多元，遍及通論、兩漢法制、《唐律》、明清律、晚清民初法制等範圍。不過，明顯集中在明清律，共有14篇，居全部25篇中的56%；而原先佔有絕對領先優勢的《唐律》相關研究，在這階段僅剩下2篇。

另外，在「中國法律思想史」方面，「奠基期」共有12篇相關的論文，其中通論性2篇、先秦諸子思想10篇。到了這個階段，以「中國法律思想史」為主題的論文減少為9篇，法律研究所出產的論文更僅剩7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14篇有關明清法律的論文中，由巨煥武先生所指導者即佔12篇。巨煥武先生乃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1970年起即在該校法律系所教授中國法制史課程，其研究的主題較傾力於明清律具體法條的分析與闡釋，²⁹

29 巨煥武先生關於法史學方面的論著主要有：（1）〈明代判決的議由欄與照由欄

因此之故，門下指導學生的法史學論文亦偏向明清律的相關研究。不過，頗堪玩味的是，巨氏所指導的論文，大多呈現了「制式化」與「公式化」的書寫傾向，除了論文題目概為「某律中的某罪」外，從其內容的鋪陳方式多為：第二章某罪的構成要件分析，第三章論某罪的犯罪型態分類，第四章則為該罪的刑罰效果，而在第五章，幾乎都拿該罪與現行法律相關規定進行比較。不過，這些比較，僅僅著眼於律文的形式要件，並未能深究傳統法制和現代法背後整體運作原理的根本差異，而不免造成「為比較而比較」的突兀感，如此寫作模式，曾引來不少的議論。

整體而言，這個時期的碩士論文品質，高下相差較為明顯，雖仍有少許被譽為較出色的優秀作品，卻也不少「應付」之作，這除了與學子本身的才情有關係外，可能與論文指導教授把關嚴格與否也有關係。但無論如何，這個世代的碩士生傳承了法史學的研究命脈，有其苦勞與功勞，仍應給予肯定。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台灣法史學界顯然無法保持著相當程度的活力，也無法蓄積足以面對接下來的轉型時期的動能。可以說，在研究這條路上，此時期雖暫時走入黃昏，卻也是邁向下個黎明的開始。

（二）博士論文的比例提升

本階段，碩博士論文發展的另外一個重大特色，乃是在法學院的法律學研究所產出了三篇博士論文，分別為：（1）〈沈家本法律思想與晚清刑律變遷〉（黃源盛，1991）；

及其記載方法〉；（2）〈明代的訴訟費用——囚紙〉；（3）〈明代律例有關官吏出入人罪的規定〉；（4）〈明代中之事後受財罪之研究〉；（5）〈明律上的囑託公事罪〉；（6）〈明清律中的失火罪〉；（7）〈明代的恐嚇取財罪〉；（8）〈清律中的恐嚇取財罪〉；（9）〈清律中的監守自盜罪〉；（10）〈屈法以伸情——清律親屬犯罪的罪刑原則與效果〉；（11）〈明刑與隱刑——沈家本考論執行死刑的方式及其場所〉等多篇。

(2) 〈朝鮮朝經國大典與中國傳統法律思想〉(韓基宗, 1992); (3) 〈中韓傳統刑律主觀主義立法〉(韓相敦, 1992)。以上三篇論文, 均出自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論作品質頗受看重。撰寫這些博士論文的研究生, 目前在國內外的大學皆已擔任教職, 除了韓相敦先生轉授當代中國法外, 其餘二人分別在台灣和韓國繼續從事法史學研究與教學的工作。³⁰

肆、1996年以後的轉型期

當時序進入到1996年之後, 台灣法學院的法史學研究與教學相較於前二個時期, 呈現了一片嶄新的風貌, 不僅輸出論文的學校再度有了變化, 師資結構也與前期大不相同, 而其間最引人注目者, 在於研究領域和寫作取材的大幅轉向。

一、論文分佈版圖的大幅推移

在此時期中, 碩博士論文合計60篇,³¹產出學校分別為: 台灣大學40篇、政治大學15篇、國防管理學院3篇、中興大學(今台北大學法學院)及輔仁大學各1篇。³²大致上, 論文產出學校的分佈情形與前期相似, 集中在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兩所學校。不過, 當中較大的變化, 乃是「奠基期」中產量居於首位的中國文化大學, 至此, 已完全退出法史學碩博士論文寫

30 黃源盛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韓基宗與韓相敦分別任職於韓國崇實大學及亞洲大學法學部教授。

31 此60篇論文的詳細資料, 請參見本文附表三。

32 國立中興大學的該篇論文為黃章一, 〈從法史學觀點論我國民法之家制〉(1996), 時年尚未改制為台北大學, 故仍以中興記之。而國防管理學院二篇為: 柯勝義, 〈從法史學觀點論我國刑法上之通姦罪〉(1993)、杜傳榮, 〈我國傳統法律教育的研究〉(1994), 論文完成時, 國防管理學院尚未改制成國防大學, 故仍以原本校名記錄。

作的行列。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首先，必須歸諸師資與課程在各校的消長。前文提到「師資之所在，即論文之所在」的原則，在本時期依然適用。在缺乏法史學專業師資的影響下，國內大部分的法律系所就連開設相關的課程都有困難，更遑論指導碩博士論文的寫作。中國文化大學在戴炎輝先生辭世以及張溯崇先生退休後，法史學的教學出現了斷層，法史學論文的乍然消逝，乃是預期中的結果。相反地，在法史學的專任師資較為完整的學校，碩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台灣大學自1993年起，除了戴東雄與林文雄兩位具備法史專業的師資外，另有王泰升先生加入教學研究的行列；而政治大學在巨煥武先生退休之後，也有黃源盛與陳惠馨兩位法史專業者接棒。與其它學校法史學師資一席難求的情況相比，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可謂法史命脈相承不斷，因此相關論文的產能遠遠勝過其它各校。此時期論文所屬學校及師資的詳細分佈情形，詳見下表七：

表七 「轉型期」論文產出學校與指導師資分佈情形

論文產出學校 指導老師	中興 大學	台灣 大學	政治 大學	國管 學院	輔仁 大學	總計
王泰升		34				34
林文雄		1				1
邱聰智					1	1
張溯崇				1.5		1.5
陳惠馨			4.5			4.5
陳起行			0.5			0.5
黃宗樂		4				4
黃源盛			9.5			9.5
楊芳賢			0.5			0.5
翟暎霞				0.5		0.5
戴東雄	1	1				2
韓毓傑				1		1
總計	1	40	15	3	1	60

其次，論文的產出與分佈，也和各校是否特別設立法史學的專業分工機制有關。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早在1970學年度起，即區分為基礎法學、私法及公法等三個組別，考取法研所的新生，入學後必須在三組當中選讀一組，並且修讀該組課程十學分以上，論文題目與學科考試亦限於該組課程範圍內，³³而在基礎法學組的領域中，主要即包括了法制史和法理學兩大學科。1991學年開始碩士班入學考試進一步採取分組招生，組別有基礎法學、公法學、民商事法學與刑事法學等四組，各有固定的招生名額，學生在修習課程、論文題目及學科考試等方面，必須受到入學組別的限制。至於政治大學的法律研究所在1995學年度以後，亦進行專業學科分組招生，成立了基礎法學組，並以法制史和法理學作為研究與教學的核心領域。

分組招生修讀學位的措施，讓研究所內各學科的專業分工變得更加精細，也使得各該研究所較注重確保各組內專業師資的質與量，無形中形成一道學生與學校之間相互篩選的門檻。有志於攻讀法史學的學子，可以積極爭取進入法史學資源較豐富的台大、政大法研所基礎法學組就讀，而將其它學校的法研所列為次要的選項；相對的，台大與政大法研所透過分組的機制，也能招收到富有法史學研究潛能，且有心致力於斯的學生。在法研所學科專業分組化的時代變遷下，對於法史學感興趣的學生集中到設有基礎法學組的學校就讀，便成為一個既定的趨勢。雖然考取基礎法學組的學生裡，可能有部分人選擇投身到法理學或其它主題的研究中，不過，此種選才的機制，至少讓學習法史學的學生來源，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此故，在這階段中，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的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能夠維持著不錯的成績。而由於台大法

33 參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研究所概況》（台北：自刊，1971），前言，頁113。

學院基礎法學組的招生規模一直維持在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組的二倍左右，³⁴所以法史學論文的數量，順勢也超過政大一倍有餘。

此外，台北大學和輔仁大學的法律研究所雖然也設立了基礎法學類的組別，但是前者的名稱為「法理學組」，入學考試選考的專業科目亦是法理學，其原本預設的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即不包括中國法史和台灣法史，因此法史學的論文僅在中興法商學院的時代產出1篇，以後即消失不見。至於後者，於2008學年度才開始成立招生，領域涵蓋法理學、法律史與國際人權法。其中，法史學的專任師資由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出身的吳豪人先生³⁵擔綱，相關碩博士論文的後續發展，尙待觀察。

二、台灣法史與晚清民國法史的蓬勃並起

從論文的研究主題來看，此時期60篇論文中，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台灣法律史等領域的論文數分別為18篇、2篇、40篇。研究主題與論文產出學校、指導師資關連性的數據統計如下：

表八 「轉型期」論文產出學校與研究主題分佈情形

論文產出學校 研究主題		論文產出學校					總計
		中興 大學	台灣 大學	政治 大學	國管 學院	輔仁 大學	
中國 法制 史	跨代通論	1		1			2
	中外比較					1	1
	先秦兩漢			1	1		2
	明清法制		1	4			5
	晚清民國			8			8

34 以2008年為例，台大基法組招收9人，政大基法組僅招收4人。

35 吳豪人，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現職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學術專長為法社會學、台灣法律史。

中國法律思想史	中外比較				1		1
	宋代思想		1				1
台灣法律史	跨代通論		20		1		21
	清治時期		3				3
	日治時期		10				10
	國治時期		5	1			6
總計		1	40	15	3	1	60

表九 「轉型期」論文指導師資與研究主題分佈情形

指導老師 研究主題		王泰升	林文雄	邱聰智	張溯崇	陳惠馨	陳起行	黃宗樂	黃源盛	楊芳賢	翟暎霞	戴東雄	韓毓傑	總計
		中國法制史	跨代通論							1			1	
中外比較				1										1
先秦兩漢								1				1		2
明清法制	1					2		2						5
晚清民國						2	0.5	5.5						8
中國法律思想史	中外比較				1									1
	宋代思想		1											1
台灣法律史	跨代通論	19			0.5			1			0.5			21
	清治時期	2										1		3
	日治時期	7						3						10
	國治時期	5				0.5				0.5				6
總計		34	1	1	1.5	4.5	0.5	4	9.5	0.5	0.5	2	1	60

何以論文主題有如此大的轉向，漸趨熱衷於晚清民國法

史與台灣法史的研究？論文、師資與課程開設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為何？

（一）研究主題的分佈

在中國法制史方面，佔居最大比例的論文，係以晚清民國時期的法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合計8篇，分別是：（1）〈論清末民初以迄當代我國刑法上姦淫罪的立法與司法演變〉（梁弘孟，2000）；（2）〈帝國之鞭與寡頭之鍊——上海會審公廨權力關係變遷研究〉（楊湘鈞，2003）；（3）〈民初建立法治國的實踐——以平政院裁決為中心〉（張焰輝，2003）；（4）〈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之研究（1912-1928）〉（黃聖棻，2003）；（5）〈民國初年「契約自由」概念的誕生——以大理院的言說實踐為中心〉（周伯峰，2004）；（6）〈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滿洲國法制〉（吳欣哲，2004）；（7）〈法律繼受與轉型期司法機制——以大理院民事判決對身份差等的變革〉（張永鉉，2004）；（8）〈民國初年親權法制的開展——以大理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黃琴唐，2008）。其中，第二篇楊湘鈞及第五篇周伯峰的碩士論文，於200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於世，確屬難得。³⁶

此外，中外比較研究的論文有1篇，為〈論法律繼受——以中日民法侵權行為現代化過程之比較為例〉（韓毓傑，1996），其涉獵的時期亦屬晚清民國。該篇為博士論文，撰者韓毓傑先生取得博士學位後，即先後任職於國防管理學院和育達技術學院，專任法制史及刑法的教席。

其餘部分，跨代通論性的論著有2篇，分別為：（1）〈從孝道思想論殺尊親屬罪概念的衍變〉（李玉璽，2001）；

36 周伯峰，《民國初年「契約自由」概念的誕生——以大理院的言說實踐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楊湘鈞，《帝國之鞭與寡頭之鍊——上海會審公廨權力關係變遷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從法史學觀點論我國民法上之家制〉(黃章一, 1996)。研究秦漢法制史的論著有2篇, 分別是: (1) 〈雲夢秦簡中秦律之研究〉(何宗昌, 2002); (2)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探微〉(張銘, 2008)。研究明清法制的論著計5篇, 各為: (1)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以官方表述為中心〉(張益祥, 2004); (2) 〈明清律典的編纂、官僚行政與刑案審判〉(黃世杰, 2005); (3) 〈清乾隆時期刑科題本之研究——以調姦本婦未成致本婦羞忿自盡類型案例為例〉(陳郁如, 2005); (4) 〈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案件為中心〉(莊以馨, 2008); (5) 〈清代人命案件的檢驗及取證模式〉(江存孝, 2008)。

在中國法律思想史方面只有2篇, 為(1) 〈從康德的超驗主義論王陽明之法律哲學〉(李春福, 1997); (2) 〈朱熹的理學與法律思想——中國傳統秩序正當性的探討〉(許耀明, 1999)。

台灣法律史領域的碩博士論文, 在這個階段進展快速, 達到40篇的產量。以涉獵的時代來看, 關於跨代通論性的論著共有21篇, 分別為: (1) 〈論關於台灣原住民土地之統治政策與法令〉(林佳陵, 1996); (2) 〈台灣法律史上國家法體系對民間習慣規範之介入——以台灣「典」規範之變遷為例〉(劉恆姣, 1996); (3) 〈台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功經過——從業到所有權〉(魏家弘, 1996); (4) 〈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上有關土地買賣的法規範〉(鄭弘基, 1998); (5) 〈百年來台灣原住民族土地分配制度的變遷與國家法令〉(梁煒智, 2000); (6) 〈台灣法律史上的祭祀公業〉(曾文亮, 2001); (7) 〈百餘年來台灣聘金制度之法律分析——兼談台灣女性法律地位之變遷〉(沈靜萍, 2001); (8) 〈台灣社會變遷下之青少年法律〉(邱錦松, 2001);

(9) 〈台灣近代行政法的生成：一種「替現」與「揭露」的書寫策略，1885~1990〉（黃丞儀，2002）；(10) 〈從法律的觀點論台灣女性離婚決定之困境〉（羅培毓，2003）；(11) 〈台灣近代型國家語言法令之形成與演變〉（吳欣陽，2004）；(12) 〈台灣刑事訴訟法朝向當事人主義修正的歷史動因〉（郭威廷，2004）；(13) 〈台灣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之變遷〉（莊惠萍，2005）；(14) 〈國家對兒童的態度的轉變——以台灣兒童福利行政與法制發展為中心〉（李燕俐，2005）；(15) 〈法律繼受與傳統融資活動——以合會與當舖在台灣的法律發展軌跡為中心〉（陳宛好，2005）；(16) 〈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劉恆姣，2005）；(17) 〈從救恤到「社會事業」——台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劉晏齊，2005）；(18) 〈病人與犯人：台灣百年來吸毒者的軌跡〉（蕭昶卉，2007）；(19) 〈國家法與原住民族習慣規範之衝突與解決〉（蔡桓文，2007）；(20) 〈台灣國家賠償制度的生成與實踐：一個以國家賠償法為中心的法律史考察〉（郭怡利，2008）；(21) 〈從民國中國的檢察制度廢棄論到當代台灣的自訴制度廢棄論〉（陳怡君，2008）。其中，第十六篇為劉恆姣的博士論文，劉氏目前任職於台灣師範大學。

此外，清治時期法律史的論著有3篇，分別為：(1) 〈調處：十九世紀台灣社會民事紛爭解決途徑之研究〉（林峻立，1997）；(2) 〈帝國的盡頭——淡新檔案中姦拐故事與申冤者〉（陳韻如，2004）。(3) 〈官府中的紛爭解決——以淡新檔案觀察相當於今日新竹市之區域之案件〉（堯嘉寧，2005）。

關於日治時期法律史的論著有10篇，分別為：(1) 〈日治時期的台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陳鈺雄，1996）；(2) 〈日本時代台灣警察制度之研究〉（李崇億，

1996)；(3)〈離婚的權利史——台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陳昭如, 1997)；(4)〈日治前期台灣不動產登記制度之研究——以台灣土地登記規則為主軸〉(宮畑加奈子, 1998)；(5)〈台灣日治時期的民事爭訟調停〉(村永史朗, 1999)；(6)〈論未成年人權利之保護——以台灣日治時期近代歐陸親權法之繼受為中心〉(綦冠婷, 2000)；(7)〈日治時期台灣漢人社會對「業」的堅持——以收益財與使用財觀念的「相剋」為主軸〉(宮畑加奈子, 2005)；(8)〈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劉彥君, 2006)；(9)〈日治末期台灣戰時法體制之研究〉(黃唯玲, 2008)；(10)〈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法的殖民近代化與日本化——全新的舊慣〉(曾文亮, 2008)。其中, 第七篇與第十篇為博士論文。

研究中華民國政府時期法律史的論文有6篇, 分別為:

(1)〈戰後台灣政治犯的法律處置〉(裘佩恩, 1997)；(2)〈法律與經濟奇蹟的締造——戰後台灣經濟發展與經貿法律體系互動之考察〉(陳維曾, 1997)；(3)〈二二八事件之法律史考察〉(羅詩敏, 2000)；(4)〈刑法性犯罪歷次修正原因之探討——以提案及審議過程為核心〉(譚德周, 2004)；(5)〈戰後台灣的律師——從個別到具體的擁護人權〉(張復鈞, 2007)；(6)〈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民法學史——以戰後一代法學期刊為史料的考察(1949~1971)〉(孫健智, 2007)。

將這些資料與前面兩個階段進行比較發現: 在「奠基期」中, 中國法制史與中國法律思想史領域的論文佔了絕對的多數, 而研究主題分別集中在《唐律》以及先秦時期的法理思想。到了「傳承期」, 研究的重心偏向明清法制, 且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比例下滑。及至此期, 論文的研究取向則呈現兩大特色: 第一, 中國法律思想史的作品嚴重銳減, 僅剩2篇, 幾近

銷聲匿跡；第二，在眾多的研究主題中，台灣法律史與晚清民國法律史兩塊領域展現著蓬勃的生氣，兩類論文的產量合計多達48篇。

（二）研究領域消長的主因

中國法律思想史方面的論文之所以逐漸消逝，從指導師資的角度言，主要與相關專業繼起人才的闕如有關。蓋早期的法史學者，對於制度史和思想史大都還能同時並重，有心於法律思想史的學子，尚有指導教授可找。例如，在「奠基期」的階段，除了陳顧遠先生外，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指導師資主要尚有戴炎輝、張慶楨³⁷與何任清等先生。戴先生個人的研究論著雖然多集中在制度史方面，不過由於他具有私塾階段養成的漢學根柢，對於思想史的掌握亦能得心應手；張先生曾著有《中國法制史》、《中國歷代法律思想》、《儒法合流論》等書，與陳顧遠先生屬於同一時期的研究者，在法律思想史方面的造詣亦佳；至於何先生，³⁸法史學雖非其專長，但或因在「法學通論」方面的長期教學和研究，使他對於傳統中國法律與思想的探索與反思，持續保持著相當的關懷。

37 張慶楨，字濟周，安徽滁州人。清光緒三十年（1904）生。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學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士，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歷任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司法組主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1948年，當選為立法委員。次年隨國民政府來台，先後任政治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臺灣大學兼任教授、中國文化學院法律研究部主任、中國文化學院哲士。著有《中國法制史》（英文）、《中國歷代法律思想》、《儒法合流論》、《海商法論》、《刑事政策》、《刑法總則》、《刑法分冊》、《刑事訴訟法講義》等書。參閱滁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滁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38 何任清（1910-）字伯澄。廣東興寧人。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東吳大學，後留學法國，入都魯士大學專攻法學理論，先後獲法學碩士、博士學位。1939年起任重慶復旦大學教授，講授刑法、國際公法、法學通論等課程。1949年來台，先後任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推事、庭長、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兼任東吳大學、軍法學校、政治大學法律學系、輔仁大學等校教授。未幾再任最高法院推事，並兼東吳大學羅馬法教授。著有《刑法概要》、《國際公法綱要》、《法學通論》等。

在「傳承期」的階段，學風逐漸演變，法史學者的研究取向多偏重於制度史一面。不過，仍有不少法理學者或西洋法制史學者在探索西方法思想與法理論的同時，往往不忘從事中西法思想內涵的比較，也投注了不少的心力在中國法律思想史的領域。因此，這個階段的法律思想史類論文大多出自他們的指導，例如林文雄³⁹、馬漢寶⁴⁰、戴東雄⁴¹等先生是。到了「轉型期」階段，法史學者的研究傾向基本承續上期，偏好於法律制度史。然另一方面，此時期新出的法理學者，大多不再涉獵中國法律思想史，所以從林文雄、馬漢寶、戴東雄等教授相繼榮退後，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碩博士論文即出現空窗期。此期間，政治大學的黃源盛雖頗用心於法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不過，他所指導的相關論文並非出產在法學院中。⁴²

從學生的角度來看，除了相關師資欠缺的原因外，何以有意投入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學子愈來愈少？是由於此一領域的主題已經難以繼續深化？還是中國法律思想史的課題對於法學院的學生，存在著較難跨越的鴻溝？或者另有它因？此仍待進一步的考察。

至於台灣法律史和晚清民國法律史研究興起熱潮的原

-
- 39 林文雄先生為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專攻法理學，並精研先秦法理思想。曾任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著有《法實證主義》（台北：作者自刊，1966）、《老莊法律思想》（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等法史學著作。
- 40 馬漢寶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主要專長為法理學、國際私法與中國法理思想等。曾任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司法院大法官等。著有《法律與中國社會之變遷》（台北：翰蘆圖書，1999）、《西洋法律思想主流之發展》（台北：翰蘆圖書，1999）、《西洋法律思想論集》（台北：漢林出版社，1977）等法史相關著作。
- 41 戴東雄先生為德國邁茵滋大學法學博士，原專攻法哲學與法制史，後來並從事身分法的研究。曾任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司法院大法官等職，法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從法實證主義之觀點論中國法家思想》（台北：作者自刊，1973）、《中世紀義大利法學與德國繼受羅馬法》（台北：三民書局，1981）。
- 42 參閱吳政霖，《朱熹思想中的情、理、法》（台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目前，黃源盛亦正指導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劉怡君博士生撰寫〈唐律中的經學思想〉等論文。

因，恐怕還是與指導師資的研究、教學取向以及台灣的政治、社會氛圍轉變有關。

以師資來說，目前台灣法學界的法史學教學與研究，先天上就存在著「小眾市場」及「邊緣性科目」的特性，對於法學院的學生而言，從事法史學的相關研究，並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有志於法史學研究的學生原本就不多。而在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先後區分基礎法學組並設立專業的研究中心後，大學部畢業生當中有意願繼續升學者，大多進入這兩所學校就讀，因此，從事法史學研究的學生集中在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已然形成基本的格局。

在台灣大學方面，1996年以後，法史學方面的專任師資有林文雄、戴東雄與王泰升三人，2002年林、戴兩位先生相繼退休後，由王泰升先生獨任。雖然近來有陳昭如女士的加入，但任教時日尚短。因此，「轉型期」階段，台灣大學法學院的法史學論文幾乎都出自王氏的指導。也由於教師個人的研究傾向，中國法制史與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之風逐漸褪去。

王泰升先生，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目前任職於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術專長為台灣法律史、傳統中國法、法與社會之研究。王氏的博士論文，是以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變革作為主題，任教台大之後，持續投入台灣法律史的耕耘，著有《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灣法律史概論》、《臺灣法的斷裂與連續》、《台灣法的世紀變革》等專書或論文集。⁴³1993年2月起，在台大法法律系大學部開設「台灣法律發展專題」，以清治末期台灣淡

43 參閱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建立》（台北：三民書局，1997）、《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臺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臺灣法的斷裂與連續》（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臺灣法的斷裂與連續》（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台灣法的世紀變革》（台北：元照出版社，2005）。

水廳、新竹縣與台北府城三行政單位的官府文書「淡新檔案」作為授課及討論的對象，首開法學院中台灣法律史教學的風氣。同年9月起，復在研究所開設「法律史專題研究」，明白揭示以台灣的法律發展歷史作為研討的對象，持續至今。1998年起，在王氏等人的推動下，台大法律系將大學部原本必修的「中國法制史」課程取消，改由講授台灣法律發展為軸線的「法律史」課程取而代之。另外，王氏又開設「傳統中國法」、「戰後法律發展史」兩課程，連同1995年起開設的「日治時期法律概論」，列為選修課。⁴⁴此後，台灣大學法學院的法律史教學，無論在大學部或研究所，多以台灣法律史為重心。而在這樣的氛圍下，該法學院1996年以後的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率以台灣法史作為研究的題材。

在政治大學方面，1996年迄今，始終維持陳惠馨與黃源盛兩位法史學的專任師資。陳惠馨女士為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法學博士，現職是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學術專長在民法親屬篇與繼承篇、德國法制史、中國法制史、非營利組織相關監督法令、兩性關係與法律、法律與文學等，其中國法史方面的研究重心則在唐清法制的分析與比較。法史學相關的主要著作有《德國法制史——從日耳曼到近代》、《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⁴⁵

黃源盛，台灣大學法學博士，現職為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學術專長為中國法律思想史、法制史與刑法。黃氏在中國法史方面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法理思想、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以及晚

44 參閱王泰升，〈從帝大到台大的台灣法律史研究與教學〉，載於《台灣本土法學》57（2004.04），頁13。

45 參閱陳惠馨，《德國法制史——從日耳曼到近代》（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

清民初的法律繼受等。

兩位教師在大學部或研究所的法史學授課內容，大致上不脫其專研的範圍。不過，由於陳惠馨教授另外分力於德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教學，因此，中國法史的教學任務，大部分由黃源盛擔綱，其在大學部設有「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二課程，同時在研究所每學期輪流講授「(中國)法制史專題研究」與「中國法律思想史專題研究」。2000年後，並在大學部開設「台灣法制史」。在政治大學法學院本階段產出的15篇碩博士論文中，有9.5篇係由黃氏所指導。

黃源盛於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博士論文〈沈家本法律思想與晚清刑律變遷〉，係國內法律學研究所首篇以法史學為主題的博士論文。⁴⁶黃氏長年以來致力於中國法史學的研究，主要相關著作有《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等。⁴⁷1995年以後，在原先研究晚清法制變革的基礎上，復投入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司法檔案的整編與研究工作，並將相關的成果投入在研究所的教學中。十多年下來，埋播的種子已見開花結果，指導近十篇研究民國初年（1949年以前）法制變革的碩博士論文，帶動了政治大學乃至海峽對岸探索晚清民國法律繼受的風潮。⁴⁸

除了師資與教學的影響外，台灣法律史和晚清民國法律史相關碩博士論文的大量出現，與台灣近二十年來政治、社會大環境的轉變，也有著相當程度的關聯。蓋此一「轉型期」

46 此前寫成法史學博士論文的張溯崇先生，畢業於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而當時該所隸屬於法學院中。

47 參閱黃源盛，《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叢書47，2000）、《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台北：元照出版社，2007）、《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台北：元照出版社，預定於2009年3月出版）。

48 參閱尤陳俊、范忠信，〈中國法律史研究在台灣：一個學術史的評述〉，載於《中西法律傳統》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39-42。

中，適逢台灣政治自由、民主化的躍進階段，人民的意識形態與思想、言論都獲得高度的解放。在此情形下，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在社會中急速地成長擴散，同時也蔓延到了法史學界，於是，以台灣這塊土地上法律發展的軌跡作為研究對象的「台灣法律史」即應運而生，台灣法律史碩博士論文也隨順因緣來到。

而就在關懷本土之聲高揚的同時，許多初入法史研究領域的年輕學子，或由於對法史學的研究應如何與現實社會及現行法制產生聯繫，心生疑惑，企盼找尋新的出口方向，同時，得助於近年來相關法制史料的整編成果，乃將視野投向「繼受法」的研究，積極地想從法史學的觀點對於現行法律進行反思。因此，關於中國法史的碩博士論文寫作，遂從以往偏重唐清律的情形，轉向晚清民國以後繼受西方法律的相關課題；此種日益重視法律繼受課題的現象，即使在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台灣法律史論文中，也有著明顯的呈現。

三、從法典史到裁判史的研究轉向

在論文的研究取材方面，回顧「奠基期」與「傳承期」的各篇博碩士論文，除了中國法律思想史類的論述係以人物思想作為研究對象外，其餘法律制度史類的著作，幾乎都將重心置於詮釋傳統中國律典（特別是唐清律）的內容。然而，到了本階段，一個極為明顯的趨勢是，多數的碩博士論文，捨棄了單純的法典史研究，而將眼光轉移到了裁判史的範圍，進一步探求律典條文的規範底下，裁判實際運作的情形。

這些研究所根據的裁判史料極為多樣，主要包括了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清朝「內閣刑科題本」、《刑案匯覽》、《刑案匯覽續編》、《刑案匯覽三編》、《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大理院刑事判例全文彙編》、《平政院裁決錄

存》、《淡新檔案》、「台灣總督府法院文書」等。其中，又以《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淡新檔案》及「台灣總督府法院文書」的使用最為常見。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乃是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司法案例彙編，收錄有正式司法案例二十則，以及學界習稱為「春秋事例」的非正式案例文書二則。⁴⁹運用此項材料的論文，為〈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探微〉（張銘，2008），該文是台灣法學界目前為止唯一針對《奏讞書》進行研究的論著。

清朝「內閣刑科題本」，係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員向皇帝奏題審判罪犯經過及會審結果的文書，最後由皇帝硃批處置方式。使用這項史料的論文，為〈清乾隆時期刑科題本之研究——以調姦本婦未成致本婦羞忿自盡類型案例為例〉（陳郁如，2005）。

《刑案匯覽》、《刑案匯覽續編》、《刑案匯覽三編》均是清代私人所纂輯的中央司法案件彙編，其中《刑案匯覽》的編者為祝慶祺、鮑書芸與潘文舫，《續編》的編者為吳潮、何錫儼、李方豫、藍佩青、薛允升，《三編》的編者為沈家本。⁵⁰利用這三部案例集進行研究者，是〈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案件為中心〉（莊以馨，2008）。

《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與《大理院刑事判例全文彙編》，為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時期的最高裁判機關「大理院」

49 參閱張銘，〈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探微〉（台北：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4-14。

50 需特別說明的是，台灣的成文出版社曾出版《刑案匯覽》，當中輯合了《刑案匯覽》、《續增刑案匯覽》、《新增刑案匯覽》三書，收錄乾隆元年至光緒十一年之案件；而文海出版社則出版了《續編刑案匯覽》，收入的案件自道光十四年起，至道光十七年為止。另外，沈家本也曾經編輯《刑案匯覽三編》，收入道光十八年起，至同治十年為止的案件，然該書尚未付梓，目前正由北京大學李貴連教授負責主持點校工作。北京古籍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一套四冊的《刑案匯覽三編》點校本，並非沈家本編輯的版本，其收錄的內容，其實等同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刑案匯覽》。

(1912-1928) 的民刑事判例全文整編；「平政院裁決錄存」，則匯整了同一時期的行政訴訟機關「平政院」針對行政訴訟及糾彈案件做成的裁決。⁵¹上述各部檔案的彙編、點校工作，由黃源盛所帶領的團隊於1995年起持續進行，目前《平政院裁決錄存》已正式出版，《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與《大理院刑事判例全文彙編》則典藏於政治大學基礎法學中心供人檢閱，並持續點校中。利用這些檔案資料完成的論文，計有：（1）〈論清末民初以迄當代我國刑法上姦淫罪的立法與司法演變〉（梁弘孟，2000）；（2）〈從孝道思想論殺尊親屬罪概念的衍變〉（李玉璽，2001）；（3）〈民初建立法治國的實踐——以平政院裁決為中心〉（張焰輝，2003）；（4）〈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之研究（1912-1928）〉（黃聖棻，2003）；（5）〈民國初年「契約自由」概念的誕生——以大理院的言說實踐為中心〉（周伯峰，2004）；（6）〈法律繼受與轉型期司法機制——以大理院民事判決對身份差等的變革〉（張永鉉，2004）；（7）〈民國初年親權法制的開展——以大理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黃琴唐，2008）。

「淡新檔案」原名「台灣文書」，是清治末期台北淡水廳、台北府、新竹縣的地方官府文書，經戴炎輝先生初步整理後改定名稱，沿用迄今。1986年以後，「淡新檔案」轉由台灣大學圖書館收藏，該館並提供檔案的影印本及微捲供研究者查閱。⁵²1993年，台灣大學歷史學系開始負責「淡新檔案」的整理點校工作，目前為止，已出版《淡新檔案》行政編16冊，民事編9冊。以「淡新檔案」之微捲或出版資料作為研究材料的

51 詳參黃源盛，〈民初大理院司法檔案的典藏整理與研究〉，收錄於氏著，《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頁89-94；黃源盛，《平政院裁決錄存（1914-1928）》（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序。

52 參閱王泰升、堯家寧、陳韻如，〈戴炎輝的「鄉村台灣」研究與淡新檔案——在地「法律與社會」研究取徑的斷裂、傳承和對話〉，載於《法制史研究》5（2004），頁267-275。

論文主要有：（1）〈台灣法律史上國家法體系對民間習慣規範之介入——以台灣「典」規範之變遷為例〉（劉恆奴，1996）；（2）〈台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有權〉（魏家弘，1996）；（3）〈離婚的權利史——台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陳昭如，1997）；（4）〈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上有關土地買賣的法規範〉（鄭弘基，1998）；（5）〈調處：十九世紀台灣社會民事紛爭解決途徑之研究〉（林峻立，1997）；（6）〈台灣法律史上的祭祀公業〉（曾文亮，2001）；（7）〈百餘年來台灣聘金制度之法律分析——兼談台灣女性法律地位之變遷〉（沈靜萍，2001）；（8）〈台灣近代行政法的生成：一種「替現」與「揭露」的書寫策略，1885～1990〉（黃丞儀，2002）；（9）〈帝國的盡頭——淡新檔案中姦拐故事與申冤者〉（陳韻如，2004）。（10）〈官府中的紛爭解決——以淡新檔案觀察相當於今日新竹市之區域之案件〉（堯家寧，2005）。

至於「台灣總督府法院文書」，本文所界定的範圍包括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遺留之民事判決原本4冊，以及各地方法院所留存的司法文書，另再加上台灣總督府法院編輯出版的判例集，⁵³其中，前二者又合稱「日治法院檔案」，目前由王泰升先生等人整編中。利用「台灣總督府法院文書」寫作的論文，略有：（1）〈台灣日治時期的民事爭訟調停〉（村永史朗，1999）；（2）〈日治時期台灣漢人社會對「業」的堅持——以收益財與使用財觀念的「相剋」為主軸〉（宮畑加奈子，2005）；（3）〈論未成年人權利之保護——以台灣日治時期近代歐陸親權法之繼受為中心〉（綦冠婷，2000）；（4）〈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

53 例如：台灣總督府覆審法院編，《覆審法院判例全集——明治二十九年至大正八年》（台北：台灣判例研究會，1914）；台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編纂，《覆審·高等法院判例》（東京都：文生書院，1995年復刻板）等。

徒」為核心〉（劉彥君，2006）；（5）〈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法的殖民近代化與日本化——全新的舊慣〉（曾文亮，2008）。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學生康托諾維奇（Hermann Kantorowicz, 1877-1940）曾經提出法律研究上「認識論的三元論」，即：狹義的法學家（作為一位規範科學家）所掌握的是法律的「規範性」（normativity）、法哲學家掌握到的是法的「理念性」（ideality）、法律社會學家（作為一位經驗科學家）所掌握的是法律的「實在性」（facticity）。而此種分析架構倘若套用在法律史的研究上，也可以區別出三種研究取向。其一是「法律的規範史」與法律解釋學所建構的法概念的歷史；其二是「法律的理念史」，即研究過往法律的精神特質所在；其三乃「法律的社會史」，指以實證的證據來掌握過去法律的實踐情形。⁵⁴大致上看來，在「奠基期」與「傳承期」，台灣的法史學碩博士論文偏重於法律規範史與概念史的研究，並涉及法律理念史的範圍；而進入了「轉型期」之後，研究法史學的學子們，立於前人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踏入探索法律的社會史，突破了法典規範靜態面觀察的侷限，從而使得過往法律生活的實態能夠清楚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伍、結語——省思與展望

世間事往往因緣和合，一切緣起，緣起一切。台灣法學院學子對於法史學的研究，歷來不乏其人，五十餘年間共產生了126篇碩博士論文，研究成果尚屬可觀。一般來說，在法律

54 參閱林端，〈固有法與繼受法〉，收錄於《法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戴炎輝先生九五冥誕紀念論文集》，頁76。

系學生多半將法史學視為「冷僻」、「無用」之物的情況下，仍能保有一脈香火，時而加以發揚光大，確屬相當難得。惟深感遺憾者，在「奠基期」與「傳承期」中，碩士論文的產量雖然不少，但因迫於出路或社會現實，大多數的學子未能繼續斯學，四十年間，僅張溯崇、黃源盛、韓基宗與韓相敦四人向上攻讀法史學博士學位，且後二位為外籍留學生。

幸而步入「轉型期」以後，台灣法學院的法史學研究，似有擺脫低潮之姿。此一時期的碩博士論文無論在質與量方面，相較前期皆有大幅的進展，尤其碩士論文，衡諸同時期日本和中國大陸的碩博士論文水準，絲毫不見遜色，甚而有凌駕之勢。更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在這些學子中，碩士畢業後繼續向上攻讀博士學位者大有人在，除韓毓傑與劉恆姣分別以法史學博士論文取得國內輔仁大學、台灣大學的學位，並已在大學擔任教職外，另有陳昭如赴美國取得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後，在台灣大學執掌教鞭；黃章一獲得北京大學法史學博士學位，任職於公務機關。⁵⁵此外，目前至少尚有十餘人正在國內及日本、美國、加拿大、德國、中國大陸等地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而其中不乏繼續以法史學研究作為志業者。此間所蓄積的學術傳承能量，相信未來會有力道展現。

然則，儘管法史學的教學與研究至此已呈現「從黃昏到黎明」的欣欣氣象，但是展望未來，仍有幾個方向值得努力：

其一、促進中國法史與台灣法史的研究交融

近十餘年來，台灣的法史學研究與教育，隱約劃成兩條進路，一條是依循著以中國法史為著眼的傳統，另一條則是重新立足在台灣主體性的意識之上。但無論選擇何種途徑，中國

⁵⁵ 此外，尚有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復以法史學碩士論文取得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的盧靜儀，業於2008年6月，以法律史專業獲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法史與台灣法史的研究似不宜偏廢。僅以現實功利言，有關中國法史的研究，在晚清民國法的部分，由於現行「六法體系」的基本架構與內涵，乃是在該一時期編訂的各部草案基礎上輾轉修訂而來，且大理院及其後最高法院的若干見解，至今仍在學術界與實務界中發生影響，⁵⁶因此，相關的探索工作有其重要意義。而在傳統法的部分，雖然傳統中國法制與現行法間已然斷裂，但是對它進行探索，仍有助於深入瞭解華人社會法意識形塑的因果歷程，也能透過傳統法與現行法制的對比，較深刻地體會近代西方法律給我們帶來的變與不變。

另就台灣法史研究的重要性而言，回顧歷史，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先後實施了《大清律例》與日本《明治民法》等，而《明治民法》對於晚清民初的民法修訂和司法實踐又發揮了強大的引導作用，故台灣和中國大陸雖然分隸於不同政權的統治之下，但卻在同一時期機緣巧合地經歷了相似的法制變革歷程。1945年，繼受自近代歐陸的中華民國法制與相關的裁判機制等移入台灣，實施以來，尚稱平順，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日治時期所進行法律近代化的結果。倘能將中國法史與台灣法史的研究成果相互觀照，相信法史學研究的深度、廣度與態度必將進一步獲得拓展。十五年前，黃源盛曾經為文呼籲，有關台灣法律史及近現代中國法史的研究宜進一步深入開發，⁵⁷對照今日情景，倒有幾分因緣巧合。

56 舉例而言，關於民法上習慣法的成立要件，大理院二年上字第三號民事判例要旨謂：「凡習慣法成立之要件有四：（一）有內部要素，即人人有確信以為法之心。（二）有外部要素，即於一定期間內就同一事項反覆為同一之行為。（三）係法令所未規定之事項。（四）無背於公共之秩序及利益。」此項見解，至今仍為學說和實務所接受。

57 參閱黃源盛，〈近五十年來台灣對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兼論法制史學的性質及其研究取向〉，收錄於《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1993），頁96-100。

其二、持續強化不同學科間的科際整合

大致說來，「科際整合」至少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理解。首先，它可以指涉各種研究社群間的深度合作關係，例如成立跨領域專長的教學與研究團隊，彼此切磋砥礪，以求取突破和進步。此外，它還意謂著面對研究與教學的各種課題時，不再侷限於單一學科的觀點，而必須藉助各種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多角度的觀照。

事實上，台灣的法史學研究在近幾年來，已就科際整合進行了不少的嘗試，也獲得了初步的成效。顯著的例子是，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明士先生於1994年發起的「唐律研讀會」，邀集了歷史、法律、社會、政治學界師生約二十多人，每月聚會一次，逐條鑽研《唐律疏議》，並擇期召開學術研討會，昕夕講貫，至今不輟。1999年至2001年間，復邀請黃源盛在台大歷史系所兼課，講授「比較刑法史」、「比較民法史」等課程，由高先生親領門下碩、博士生十餘人到課聽講。這首開了台灣法學界與史學界的學術交流與科際整合，多位新生代法史俊彥於焉養成。⁵⁸

又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98年成立「法律史研究室」，並於2002年至2004年間組成「審判：理論與實踐」研讀會，針對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擬訂數個重要主題，定期聚會研討、報告。在此研讀會中，成員涵蓋了法學界、史學界、社會學界、哲學界和中文學界的研究者與學生。至於其它科際整合的例子亦屬不少，如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與中研院史語所之間、台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與政大歷史學系、中研院台

58 例如，羅彤華女士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桂齊遜先生現任文化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登武先生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俊強先生現任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以上諸教師均在歷史學系講授法制史相關科目。

史所之間的密切交流互動，皆係科際整合的範例。⁵⁹

透過特定議題的討論，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往往可以發現自身學科視野的死角與侷限，藉助其它學科的觀點，這些不足因而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彌補。例如：法學界的研究者在側重法律規範義理的考察與評價時，已經較能意識到社會實效面及法制所處歷史脈絡的不可忽略性；相對於此，史學界的研究者在考證、敘述法制歷史的客觀現象之餘，也開始嘗試探尋法律規範的體系與意義，以及蘊含在規範背後的價值理念。換言之，各學科之間相互取法所長，促使研究的視角益加完整而深刻。

從「轉型期」的碩博士論文書寫方式來看，科際整合對於法學院的研究生確實已經產生或淺或深的效果，例如裁判史與法律社會史的研究主題大量興起，這與學生們接觸社會學界和史學界的觀點後相互激盪，具有牽連的關係。

不過，科際整合並非指不同學科必須放棄自身原本關注的重點而歸化於其它學科，也不是為了發展一個統合各個學科的研究典範，使研究的模式趨向一元化，而是期望各個學科在觀察、分析、詮釋歷史上的法律現象時，能夠體察到本身學科的不足，同時試著理解其它學科的觀點與長處，進而截長補短，使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能獲得提升。雖然法史學研究的科際整合工作此前已經展開，但是如何使各個學科之間的互動關係更為密切，進而建立長久的合作機制，仍是值得再推進的目標。

其三、注重行深法史基礎理論人才的培養

綜上所述，五十年來台灣法學院法史學碩博士論文的一

59 例如王泰升先生為台大法律學系與中研院台史所合聘專任教授，並曾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及台灣歷史研究所開授台灣法律史相關科目。

大演變趨勢，乃是台灣法史與晚清民國法史的乍然興起。與此同時，作為法史學源頭與根基的思想史和上中古史卻急速消逝，不能不說是件遺憾的事。雖然，台灣法史、晚清民國法史與現行法及本土社會間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其投入者眾多，其發展蓬勃，乃在預期之中。然而，從治學的角度來看，「根固枝乃茂，本立而道生」，作為中國法史或台灣主體性下之「傳統中國法」源頭的先秦政法思想，以及秦漢、隋唐等法制歷史，倘若研究人才出現斷層，亦屬我們所不樂見的淺碟式研究現象。因此，未來在法學院中，也應設法培養相關領域的人才。

當然，法史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理想上，固應多鼓勵研究生撰寫法史相關論文，但現實上，在台灣的法學界，無須也不太可能要求過多學子投入此一「有閑法學」領域；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擇優栽培」，畢竟為學在「質」不在「量」。或可藉由論文指導教授之推薦，或由法制史學會等相關組織主動拔擢，挑選若干篇優秀論文，交由相關出版社贊助付梓問世，以廣流傳。又可鼓勵優秀的畢業碩士生投考國內外博士班，繼續進修博士學位；並擇優舉薦到各校擔任大學部法史課程教師，以培植繼起人材。讓有心於焉的研究生，能安心放步，行深下去，如此足矣！

附表一 「奠基期」(1956年~1978年)碩博士論文概況⁶⁰

	序列	姓名	學校	題目	研究類別	研究斷代	碩士	博士	指導教授
1956 (民45)	1	黃靜嘉	政大 (政研)	日本帝國主義之下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	台灣	日治時期	◎		方豪
1962 (民51)	1	施啓揚	台大	唐律上盜罪之研究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炎輝
	2	尹載秀	台大	親等制度之法制史的研究	中國	跨代通論	◎		戴炎輝
1963 (民52)	1	張溯崇	文化	唐律除免當贖法之研究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炎輝
1964 (民53)	1	林茂松	文化	論唐律二罪以上從重與更犯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炎輝
	2	潘維和	文化	唐律家族主義論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炎輝
	3	武九靈	文化	韓非子法律思想之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何任清
1965 (民54)	1	張瑞釗	文化	唐律上犯罪構成要件之研究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炎輝
	2	魏季倫	台大	韓非法思想之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張慶楨
1966 (民55)	1	羅正展	文化	我國固有法上之刑官	中國	跨代通論	◎		陳顧遠
	2	林銘治	文化	儒家法律思想	思想	先秦兩漢	◎		張慶楨
	3	施湘興	文化	先秦法家法律思想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陳顧遠
1967 (民56)	1	梁開天	文化	墨子法律思想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陳顧遠
1968 (民57)	1	帥珂羅	台大	清代婦女之法律地位	中國	宋元明清	◎		戴炎輝
1969 (民58)									
1970 (民59)	1	黃錕炎	文化	唐律立法精神之研究	中國	魏晉隋唐	◎		陳顧遠
	2	薛博允	台大	中國古代法治思想之研究	思想	跨代通論	◎		韓忠謨
1971 (民60)	1	李伸一	文化	唐律上之共犯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炎輝
	2	高吉臨	文化	管子法律思想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陳顧遠
	3	耿雲卿	文化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與自然法	思想	先秦兩漢	◎		何任清
	4	王文	文化	中國典權之研究	中國	跨代通論	◎		陳顧遠

60 本表的排序方法除依年代之外，在同一年中，若有多所學校同時有論文產出者，則以該校筆畫為排序，附表二、三亦同。

附表二 「傳承期」(1979年~1995年)碩博士論文概況

	序列	姓名	學校	題目	研究類別	研究斷代	碩士	博士	指導教授
1979 (民68)	1	陳時提	台大	從分析法學的觀點論韓非的法律思想	思想	先秦兩漢	◎		林文雄
1980 (民69)	1	那思陸	中興	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研究	中國	宋元明清	◎		林咏榮
1981 (民70)	1	武藤邦夫	台大	董仲舒法律思想之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林文雄
	2	李進勇	台大	孔子法律思想之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林文雄
1982 (民71)	1	黃源盛	中興	漢代春秋折獄之研究	中國	先秦兩漢	◎		林咏榮
1983 (民72)									
1984 (民73)	1	金根植	中興	中日韓三國近親禁婚及同姓結婚之比較研究	中國	中外比較	◎		林咏榮
1985 (民74)	1	韓基宗	中興	中國先秦法律思想與羅馬法律思想比較研究	思想	中外比較	◎		馬漢寶
	2	蔡瑞煙	政大	明律之誣告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1986 (民75)	1	莊進國	文化	唐律與現行刑法上有關親屬犯罪之比較研究	中國	魏晉隋唐	◎		張溯崇
	2	鄭淑屏	輔仁	臺灣在日據時期警察法令與犯罪控制	台灣	日治時期	◎		蔡墩銘
1987 (民76)	1	謝靜雯	台大	大清新刑律的禮教爭議	中國	晚清民國	◎		張偉仁
1988 (民77)	1	林永義	文化	清末民初法律演變之研究	中國	晚清民國	◎		張溯崇
	2	陳華	台大	施公案與清代法制	中國	宋元明清	◎		張偉仁
	3	金珍煥	台大 (政研)	韓非子的法術思想	思想	先秦兩漢	◎		盧瑞鍾
	4	鄭貴和	台大 (政研)	荀子的禮治思想	思想	先秦兩漢	◎		孫廣德
	5	韓相敦	政大	中韓刑律中之事後受財罪	中國	中外比較	◎		巨煥武
1989 (民78)	1	宋國業	政大	明清律中的竊盜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1990 (民79)	1	侯英泂	台大	唐律上婚姻規定之探討	中國	魏晉隋唐	◎		戴東雄
	2	李金澤	政大	明清律中的賭博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3	簡松柏	政大	明清律中之白晝搶奪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4	韓毓傑	政戰	管子與子產法治思想之研究	思想	先秦兩漢	◎		張溯崇
1991 (民80)	1	黃源盛	台大	沈家本法律思想與晚清刑律變遷	思想	晚清民國		◎	戴東雄
	2	陳仙丹	台大	從固有刑律看傳統婦女地位之演變——由固有刑罰與緣坐之觀點出發	中國	跨代通論	◎		戴東雄
1992 (民81)	1	韓基宗	台大	朝鮮朝經國大典與中國傳統法律思想	思想	跨代通論		◎	馬漢寶
	2	韓相敦	台大	中韓傳統刑律主觀主義立法	中國	中外比較		◎	韓忠謨 林文雄
	3	陳美伶	政大	清律中之詐欺官私取財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1993 (民82)	1	林永富	政大	清律中的誤殺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2	林德川	政大	清律中之放火故燒人房屋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3	柯勝義	國管	從法史學觀點論我國刑法上之通姦罪	中國	跨代通論	◎		黃源盛
1994 (民83)	1	許必奇	政大	明律中的風憲官吏犯贓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2	劉興浪	政大	明律中的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3	宋名晰	政大	清律中的「坐贓致罪」罪——社交禮儀餽贈之刑事立法例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4	吳武川	政大	清律中的略人略賣人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5	杜傳榮	國管	我國傳統法律教育的研究	中國	跨代通論	◎		黃源盛
1995 (民84)	1	沈宏裕	政大	清律中的私鑄銅錢罪	中國	宋元明清	◎		巨煥武

附表三 「轉型期」(1996年~2008年9月)碩博士論文概況

	序列	姓名	學校	題目	研究類別	研究斷代	碩士	博士	指導教授
1996 (民85)	1	黃章一	中興	從法史學觀點論我國民法之家制	中國	跨代通論	◎		戴東雄
	2	林佳陵	台大	論關於台灣原住民土地之統治政策與法令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3	陳鈺雄	台大	日治時期的台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4	李崇偉	台大	日本時代台灣警察制度之研究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5	劉恆奴	台大	台灣法律史上國家法體系對民間習慣規範之介入——以台灣「典」規範之變遷為例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6	魏家弘	台大	台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有權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7	韓毓傑	輔大	論法律繼受——以中日民法侵權行為現代化過程之比較為例	中國	中外比較		◎	邱聰智
1997 (民86)	1	陳昭如	台大	離婚的權利史：台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2	裘佩恩	台大	戰後台灣政治犯的法律處置	台灣	國治時期	◎		王泰升
	3	林竣立	台大	調處：十九世紀台灣社會民事紛爭解決途徑之研究	台灣	清治時期	◎		戴東雄
	4	陳維曾	台大	法律與經濟奇蹟的締造——戰後台灣經濟發展與經貿法律體系互動之考察	台灣	國治時期	◎		王泰升

	5	李春福	國管	從康德的超驗主義論 王陽明之法律哲學	思想	中外比較	◎		張溯崇
1998 (民87)	1	鄭宏基	台大	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 上有關土地買賣的法 規範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2	宮畑 加奈子	台大	日治前期台灣不動產 登記制度之研究—— 以台灣土地登記規則 為主軸	台灣	日治時期	◎		黃宗樂
1999 (民88)	1	村永 史朗	台大	台灣日治時期的民事 爭訟調停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2	許耀明	台大	朱熹的理學與法律思 想——中國傳統秩序 正當性的探討	思想	宋元明清	◎		林文雄
2000 (民89)	1	綦冠婷	台大	論未成年人權利之保 護——以台灣日治時 期近代歐陸親權法之 繼受為中心	台灣	日治時期	◎		黃宗樂
	2	羅詩敏	台大	二二八事件之法律史 考察	台灣	國治時期	◎		王泰升
	3	梁煒智	台大	百年來台灣原住民族 土地分配制度的變遷 與國家法令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4	梁弘孟	政大	論清末民初以迄當代 我國刑法上姦淫罪的 立法與司法演變	中國	晚清民國	◎		陳惠馨
2001 (民90)	1	曾文亮	台大	台灣法律史上的祭祀 公業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2	沈靜萍	台大	百餘年來台灣聘金制 度之法律分析——兼 談台灣女性法律地位 之變遷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3	李玉璽	政大	從孝道思想論殺尊親 屬罪概念的衍變	中國	跨代通論	◎		黃源盛
	4	邱錦松	國管	台灣社會變遷下之青 少年法律	台灣	跨代通論	◎		張溯崇 翟嘖霞

2002 (民91)	1	黃丞儀	台大	台灣近代行政法的生成：一種「替現」與「揭露」的書寫策略（1885~1990）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2	何宗昌	國管	雲夢秦簡中秦律之研究	中國	先秦兩漢	◎		韓毓傑
2003 (民92)	1	羅培毓	台大	從法律的觀點論台灣女性離婚決定之困境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2	楊湘鈞	政大	帝國之鞭與寡頭之鍊——上海會審公廨權力關係變遷研究	中國	晚清民國	◎		黃源盛
	3	張焜輝	政大	民初建立法治國的實踐——以平政院裁決為中心	中國	晚清民國	◎		黃源盛
	4	黃聖棻	政大	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之研究（1912~1928）	中國	晚清民國	◎		陳惠馨
2004 (民93)	1	吳欣陽	台大	台灣近代型國家語言法令之形成與演變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2	陳韻如	台大	帝國的盡頭——淡新檔案中姦拐故事與申冤者	台灣	清治時期	◎		王泰升
	3	郭威廷	台大	台灣刑事訴訟法朝向當事人主義修正的歷史動因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4	譚德周	台大	刑法性犯罪歷次修正原因之探討——以提案及審議過程為核心	台灣	國治時期	◎		王泰升
	5	張益祥	政大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以官方表述為中心	中國	宋元明清	◎		陳惠馨
	6	吳欣哲	政大	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滿洲國法制	中國	晚清民國	◎		黃源盛
	7	周伯峰	政大	民國初年「契約自由」概念的誕生——以大理院的言說實踐為中心	中國	晚清民國	◎		黃源盛

	8	張永鈺	政大	法律繼受與轉型期司法機制——以大理院民事判決對身份差等的變革	中國	晚清民國	◎		黃源盛 陳起行
2005 (民94)	1	黃世杰	台大	明清律典的編纂、官僚行政與刑案審判	中國	宋元明清	◎		王泰升
	2	莊惠萍	台大	台灣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之變遷	台灣	跨代通論	◎		黃宗樂
	3	李燕俐	台大	國家對兒童的態度的轉變——以台灣兒童福利行政與法制發展為中心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4	堯嘉寧	台大	官府中的紛爭解決——以淡新檔案觀察相當於今日新竹市之區域之案件	台灣	清治時期	◎		王泰升
	5	陳宛妤	台大	法律繼受與傳統融資活動——以合會與當舖在台灣的法律發展軌跡為中心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6	劉恆姣	台大	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7	劉晏齊	台大	從救恤到「社會事業」——台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8	宮畑加奈子	台大	日治時期台灣漢人社會對「業」的堅持——以收益財與使用財觀念的「相剋」為主軸	台灣	日治時期		◎	黃宗樂
	9	陳郁如	政大	清乾隆時期刑科題本之研究——以調姦本婦未成致本婦羞忿自盡類型案例為例	中國	宋元明清	◎		陳惠馨

2006 (民95)	1	劉彥君	台大	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2007 (民96)	1	蕭昶卉	台大	病人與犯人：台灣百年來吸毒者的軌跡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2	張復鈞	台大	戰後台灣的律師——從個別到具體的擁護人權	台灣	國治時期	◎		王泰升
	3	蔡桓文	台大	國家法與原住民族習慣規範之衝突與解決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4	孫健智	政大	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民法學史——以戰後一代法學期刊為史料的考察（1949～1971）	台灣	國治時期	◎		陳惠馨 楊芳賢
2008 (民97)	1	黃唯玲	台大	日治末期台灣戰時法體制之研究：從戰時經濟統制邁向「準內地」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2	郭怡利	台大	台灣國家賠償制度的生成與實踐：一個以國家賠償法為中心的法律史考察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3	曾文亮	台大	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法的殖民近代化與日本化——全新的舊慣	台灣	日治時期		◎	王泰升
	4	陳怡君	台大	從民國中國的檢察制度廢棄論到當代台灣的自訴制度廢棄論	台灣	跨代通論	◎		王泰升
	5	莊以馨	政大	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案件為中心	中國	宋元明清	◎		黃源盛
	6	江存孝	政大	清代人命案件中的檢驗及取證模式	中國	宋元明清	◎		黃源盛

	7	黃琴唐	政大	民國初年親權法制的開展——以大理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	中國	晚清民國	◎		黃源盛
	8	張銘	政大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探微	中國	先秦兩漢	◎		黃源盛

The Heritage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Study on the Master's and PhD Theses of the Legal History from the Schools of Law in Taiwan

Huang, Yuan-Sheng

Huang, Chin-Tang

Chiang, Chun-Hsiao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he legal history, the subject of study covers at least four aspects, which includes the legal rules, the legal system, the legal thinking, and the knowledge and concept of law. Under the aforementioned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the com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ter's and PhD theses regarding the legal history gathered from the schools of Law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Three stages can be sorted and concluded from the changes observed in teach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overall direction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of such theses. The first stage extends from 1956 to 1978,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1979 to 1995, which is the heritage period. Finally, the past fifteen years can be account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volving drastic adjustments.

Judging from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re has been a diversity in the topic of research in the legal history due to the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the teach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shift in the social atmosphere, coupl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allocation of schools of which the theses are generated. The special feature of

this diversity is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received by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Taiwan's legal history and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Late Ch'ing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court rulings.

It is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ster's and PhD theses from the schools of Law in Taiwan can we see to its future progress. There are still areas where continuous efforts must be dedicated in leg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regarding the field of the legal history. First of all, there must be more advancement in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egal history and Taiwan's legal history. Secondly, there must be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methods and concept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departments. Thirdly, attention must be plac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tential talent who would place emphasis on the theory of the legal history. Last but not least, the incubation of potential talent for the research in the legal history may adopt the method by training of selected few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The Chinese legal history, The Chinese legal thinking history, Taiwan's legal history, Master's and PhD theses